

# 第一章 緒論

著名文化学者叶舒宪在总结文学功能时明确指出：“文学何为：人类精神的自我救援。”<sup>①</sup>显然，人类是符号动物，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文学生物”。推而广之，文学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文化是观测社会语态和人类行为的解读密码，是人类争夺话语权的舞台。

自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相遇，一百年来，尤其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现实应用，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一大批有立场、有理想、有创造的优秀作家，以铁肩担道义，用妙笔著文章，自觉站在“文化人类学”的思想高度，紧紧抓住“人类”意义的精神内涵，将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民族、宗教、神话、自然等核心符码，视为一个彼此融合、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努力让文学生长在时代文化的深厚土壤里，以“天下观”的总体视域进行由“文学民族性”向“文化世界性”转化的思想创造和文本实践。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优秀长篇小说，以人为本，“以文化人”，贯通 20 世纪的人文动脉，追求文化人类学的思想高度、哲学高度和美学高度，越来越呈现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的发展趋势，彰显出人文精神的格局与气度，向生命阐释一切存在的可能性。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sup>②</sup>作为文坛“航空母舰”的长篇小说，以人为本，深入探索与发现人生逻辑与现实存在间的种种关系，其核心指向生命“圆融”的灵魂高贵。学者普遍认为，“所谓写小说，就是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其中不可通约的一面推向极致。身处生活的繁复中，试图对这种丰富性进行表征，小说所揭示的是社会生活的深刻困惑。”<sup>③</sup>确实如此，长篇小说在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刻困惑的过程中，努力打造充满张力、智慧和温暖的世界，愈加呈现“文学人类学”升华为“文化人类学”价值的立体性、多维性和开放性，实现由文学“我者”向文化“他者”的整体辩证拓展。这种独具“文化人类学”魅力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紧贴现实的“生活流”和富有冲击力的“世界波”，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情诠释了普世“人学”的社会主题，不仅促进了文学艺术与时代脚步同频共振的繁荣发展，也给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机会，打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显著提高。

“中国故事”的世界性叙事，承载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理念，正在建构起 21 世纪人类文化的“跨太平洋诗学”，进一步提升世界话语谱系的“中国性”，呈现时代风云与人类神情多维映照的世间魅力，与世界文化产生强烈共鸣，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中国的话语权。优秀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其人文价值贡献率达到历史性新高，具有里程碑意义。

守住文学的方寸，就是守住生命的灵魂；拓展文化的空间，就是创造人类的容颜。

---

① 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教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② 张少康. 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 [德]瓦尔特·本雅明. 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M]. 李茂增，苏仲乐，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伟大的作家必是哲学家。”<sup>①</sup>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越困惑，文学越执着，进而文本的精神内涵也就越深刻。无疑，文化的发展和深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一定具有连带性、综合性、整体性、辩证性和趋向性，必将出现由表及里和从内至外的全局性变化。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人类学”趋向，呈现整体性建构与拓展的可喜态势，以优秀长篇小说为代表的多种体裁，著“人”而歌，群起而舞，文坛上掀起“文化人类学”思想质地和艺术修为的时代主潮。一大批优秀作家努力从生命图腾的肌理中发掘内在的规律性价值本质，在市场经济“重金属”压迫下共同打捞沉落深海的人性“黑匣子”，进而探求生命世界的精微与广博，用心修复一颗颗已经畸形的灵魂。优秀长篇叙事小说努力寻找人类社会的精神家园，整体上行于从文学到文化、从人群到人类、从“高原”到“高峰”的人文征程，实现了对文学的“文化人类学”艺术创造的历史性突破。

黑格尔(Hegel)指出，“艺术的概念正如国家的概念一样，既需要有一个为个别方面所共同的目的，又需要有一个较高的实体性的目的”。<sup>②</sup>一个时代的文学所达到的高度，是通过重要作家和优秀作品来实现的。我们说，“在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小说与人生、文学与存在、文化与人类，这些以人文思想为核心的‘世界观’，到底是何种样态？都存在着哪些隐秘关系？在时代变化的复杂现场，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什么样的‘入场’‘在场’与‘占场’的奋进状态，进而形成长篇叙事的人文‘气场’，构建起一种符合人类情感的文化逻辑，探索生命存在的真正价值，立体化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适主题”。这些问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人类文化亟待深入研究和阐释的时代课题。

目前，国内外对个体作家作品中“文化人类学”思想与样态进行分析研究，存在零星化、单体化的情况，多为一人一议，一文一说，还没有形成立体化、纵深化、多维度的研究成果。而围绕群体作家作品“文化人类学”的建构与拓展，进行贯通20世纪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对新中国21世纪长篇叙事小说中的“文化人类学”因子进行整体性、格局性和趋向性的深入研究，进而全面阐述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智慧和普适意义，学术界还没有先例。

本书共十一章，总计约24万字。主要以曹文轩、魏巍、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迟子建、柳青、阿来、苏童、韩少功、张炜、姜戎等优秀作家的多部长篇小说为主体范例，以国内外“文化人类学”经典理论著作为学理依据，直面新中国文学现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价值建构与拓展，做出哲学、美学、民族和历史维度的纵向论述。同时结合优秀作品加以横向阐释，不仅注重文本的个体价值，更注重叙事的群体哲学，深入勘探、考察生命内部无以穷尽的人类文化存在的可能性，进而重点推论新中国“文学人类学”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立体化价值存在，分析中国文学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适意义，着力构建一种安放灵魂的文化容器，孕育每一粒生命中饱含无限可能的种子，给出世间民众每天醒来都充满无限希望的理由，在人生的凡性中寻找人类的“神性”。

一个时代的肉身觉醒，必将是灵魂的文化诗学。

① [法]阿贝尔·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M]. 杜小真，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② [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第二章 “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要义与外延

文化学者从国际视域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人类学”，就必须要有从本源上阐述何谓“人类学”。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对人类自身进行全面综合性研究的一门理论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类学是着重从自然界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角度对人类自身发展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人文学科群，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人类学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滥觞的重要价值，其研究主题着重体现人类生物性基础的文化性，同时追溯人类文化之当代特质的源头与演变；第三种观点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主要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理论学问。三种观点大同小异，不过学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第二种观点最早见于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对人类高尚品德及行为的理论阐述。它的核心要点在于突出人类学的“人文学科群”和“人类生物性基础的文化性”，也就是把人类学的狭义性、广义性和延展性，都留出了起源定位与集群式涵濡的文化内涵空间。

由于“人类学”核心要点具有集群式的广阔文化空间，自1501年德国学者首次使用“人类学”一词以来，“文化”(culture)便成为“人类学”学科主要概念与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学之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深知文化之于“人类学”生命意义的重要性。1871年，他在代表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对“文化”做出了科学的定义，泰勒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定义“文化”的人。泰勒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sup>①</sup>泰勒的《原始文化》是人类学文化意义与价值观的经典之作。同样地，他对“文化”内涵的科学定义，也具有理论要义的经典性。至今，《原始文化》仍然是我们深入理解、全面阐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进程中文化问题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准则。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具有人本属性的根基性。“文化人类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无论东西方理论学派如何对其进行狭义与广义的划分界定，其实质都是一门以人类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狭义概念的“文化人类学”，是指针对“异文化”的自身性研究，基于“田野工作法”对特定人类群体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学科。在西方少数国家，把狭义概念的文化人类学称为“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广义概念的“文化人类学”，是目前普遍流行并被学者广泛运用的主要观点。本书所论述观点的内涵与外延，是广义概念上的“文化人类学”。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被认为是一门运用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从而探讨人类文化的本质和意义的学科，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三个分支学科”。<sup>②</sup>由此可见，“文化人类

<sup>①</sup> 周大鸣. 文化人类学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sup>②</sup> 周大鸣. 文化人类学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学”具有考古意义的本源性、语言能效的交流性和民族范围的族群性，其基本研究方法为考古化的实地考察法、语言结构的思维情境论和民族文化的分析比较观。文化人类学与内蕴广博的社会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人类学始终带有与时俱进的“文化解放性”。

“文化人类学”的核心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本我”“自我”“他我”多维组成的“人”为根基。人是一种极具文化性的动物，其文化能力根植于人类的生物本性，这种本源化的特殊性，决定着“文化人类学”的生命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进一步讲，人类的生物性、文化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转化平衡，为文化人类学的根本存在和现实意义奠定了无穷无尽的科学价值。从理论上看，尽管200多年前，“人类学”学科衍生出“语言人类学”“政治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军事人类学”“哲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诸多分支。但是，最具根本性、涵濡性和全局性的“文化人类学”，永远是人类学的“首学”，正不断呈现与生俱来的蓬勃生命力和时代文化价值。

20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本身涵盖的文化“相对论”、文化“比较观”和文化“整体观”，使其本质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和实际应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和应用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尤其是21世纪以来，它越来越展现出独特而有影响力的文化价值。显然，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其实都是文化意义上的辩证问题。文化本质的共享化、递进化和整合化的社会效应，都会产生文化逻辑的解决方法，由此必然创造出“文化人类学”的广阔外延。对“人”的学问的丰富性和无穷性赋予它生命存在的世界观。多年来，“尽管文化人类学家的发现经常形成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结论的挑战，但是，对他们来说，人类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唯一一种一贯地纠正受文化束缚的主张”。<sup>①</sup>无疑，“文化人类学”在文学领域中的方法论、世界观和审美创造，一定会如唐代尚颜所言，“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 第二节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三个定义不同的专属概念。

本书所指的是“文学的‘文化人类学’”。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文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个具有跨学科意义的专属学科概念。从宏观上看，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和共融性，彼此相互交叉、融会贯通。文学人类学在文学专业方面通常被理解为以人类学视野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这是文学研究者在人类学影响下探索出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如果从人类学专业立场看，文学人类学又可称为‘人类学诗学’，是以文学方法展开民族志写作的创新性表述方式，目的是尽量避免西方科学范式和术语在表述原住民文化时的隔膜与遮蔽作用，尽可能带有感性地、完整和丰富地呈现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sup>②</sup>而

① [美]威廉·A. 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瞿铁鹏, 张钰,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② 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教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文化人类学”在本书的第一节已作具体介绍，它是人类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具有人本属性的精神根基性，是一门以人类文化为主要思考和研究对象的学科。尤为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具有“文化的共享性与习得性”。<sup>①</sup>由此，文化的实践性与功能性、文化的适应性与变迁性便有了根基与条件。

在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中，“文学”一词是“文化人类学”的定语，既是根本前提条件，也是一种范围界定，其核心在于文学属性的内涵与外延，是“文化人类学”在文学专属领域的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它指作家的思想站位、人文情怀、叙事创造、审美修为和思想艺术追求，表现为文学作品中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的精神属性、叙述特质和美学神态。作品中“以文化人”的文化人类学因子和气质丰富而立体，形成文学作品普适性和人类性的思想脉络与艺术表现。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具有“乡土质地”的人文情怀。土地的存在，处处充满着情感建构中的人文社会价值，优秀文本通过展现变幻无穷的世界图景，诠释“三农”现实榫卯处的生命辩证法，用“土命”之笔演绎文化人类学的隐秘“法则”，播种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希望之果，彰显大地母亲的哲学根基。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是书写“民族意识”的人类寓言。中国当代文学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已从民族化升华为民族志，由“民族记忆”逐渐形成“民族意识”，一步步向“文化人类学”的核心地带拓展。地方性知识的国际化视野，凝聚出一种强大的“民族志”精神力量，帮助作品穿越存在主义的现实“黑洞”，建构和描绘人类世界的精神寓言。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从人类中心主义或“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转向以生态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崇尚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无限生机，倡导“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文明观。“中国生态文学具有独特的渊源和哲学根底、内涵特质与类型样式，显示出独特的价值与中国表达。”<sup>②</sup>由此创造出社会生活文化赋能的现实可能性。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充分展现战争的精华是文化命运的展开。在中国革命筚路蓝缕、改天换地的百年历程中，对带有历史标志性质的重大战事给予“军旅人文”的史诗性追求，塑造出属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学形象，由此诞生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进而回应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体现“普适意义”的生命观照。在世间冷暖的生命地带和灵魂时空中，它与时代前行的脚步同频共振，深切表达对民众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图景里，真诚而深沉地面向世界，坚守并弘扬人类文明的生命光辉。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还努力“重述神话”，对人类的童年进行文化意义上的生命演绎，以此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生动阐述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围绕人类的思想文化观念，它通过文学进一步论证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大千世界之间的关系。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作家大多自觉采用“田野调查法”，把人类学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安乐椅”上带到科学的研究的广阔领域。他们充分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以更多、更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在艺术创作中探索“文化人类学”的实践路径。

① 周大鸣. 文化人类学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② 李朝全. 生态文学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表达[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1(4)：58-59.

本书“文学的‘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主要以作家思想和作品文本为基石，贯穿20世纪以来的人文现场，尤其着重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现场的优秀长篇小说文本。研究旨在探讨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一步提炼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追求彰显人文精神格局与气度的思想高度、哲学高度和美学高度。可以说，论述文学“文化人类学”的根本目的，就是紧紧抓住“人类”意义的精神内涵，着力打破学科视域的局限与桎梏，把文学、历史、民族、哲学、美学、国学、宗教、神话、生态等视为一个彼此融合、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研究注重将文学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语言，放到世界文化意义的总体格局中去，进而实施“文学性”向“文化化”转化过程中的文本思想与艺术实践的考察、挖掘、锻造和升华，从文学的“叙事治疗”向文化人类学的精神实质迈进。在此基础上，研究以“文化人类学”思想为核心，阐述新中国文学价值与意义所实现的再开创和再扩容，真情呼唤一个社会变革中凤凰涅槃的文学世纪复兴，更好地构建和延展“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学世界观，为转型社会的时代现场送上抚慰灵魂的文学关怀，给世界文坛的“东方叙事”增添了人文天下的中国神采和气概。

###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在现代中国：相遇与接受

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20世纪初，克罗伯就坚定地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人类学时代”。如果仅仅从学科领域的角度讲，克罗伯认定的这一观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理论突破，因为此观点的专业意义远远大于社会意义。但是，我们若从人类学体系的建构上来看，100多年前，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在西方确实已进入具体实施和全面推进阶段。在此期间，文化的实质内涵越来越上升至人类学的核心地带，“文化人类学”成为西方理论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并在世界上得到广泛认同和有效传播。

1871年，泰勒出版了“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原始文化》，对原始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全面阐述了关于文化发展阶段和脉络走向的独到见解。泰勒提出的奠基性、标志性的思想观点，对于“文化整体性”的理论界定，至今仍是理解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力宣传和引入西方的进步思想文化，打开国人的文化视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正是在这一时期，泰勒的《原始文化》被译介到中国，由此，“文化人类学”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这赋予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类学的整体视野，开启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化之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性相遇，使现代文学具有了世界性的共同心理、理想追求、民族意识和文化品格。“西学东渐”的影响没有“有效期”，只有“增值期”，它超越了狭隘的区域概念，给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一种文化方法，以一种贯通中西、融汇古今的宏阔视野审视人类文化。这种世界性的思想观念超越了种族、地域、语言和模式的局限，进而升华为一种人文领域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

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传入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两者看似“不期而遇”，实则“殊途同归”，最终相得益彰，共同打开了现代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之门。当年，马君武先生翻译的《赫尔克一元哲学》，其中第一章的题目即为“人类学”。不久后，《新青年》又刊载了陶慕恭对《人类文化起源》一文的介绍。这两篇文本都涉及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观点。除《新青年》外，还有许多报刊，也纷纷围绕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多维度的宣传与介绍。

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人的觉醒”迅速发展。“人的发现与觉醒”引领现代文化寻找自身定位。由此，生物进化论和文化人类学适逢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强大文化助力。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发表，从进化论的人类观和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体角度，阐释文化人类学在当时的社会价值。“五四”时期，非常流行的“问题小说”便是在“人的发现与觉醒”中，体现出文化人类学的时代特征。茅盾先生多次提出“真文学是与人类文化有关的文学”的理论观点，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见证和认同。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位提出“世界主义”的文化学者，是自觉践行文化人类学理论观点的开创性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最早具有世界观念的文化先驱。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sup>①</sup>

在《人之历史》及《随感录·四十九》中，鲁迅从人类种族发生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人类起源及其系统，全面论述了现代人与未来世界存在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传入中国后，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找到了一种观察生活的视角和方式，也就是在考察中国传统文明的原始性中发现大众心理的“阿Q性”。鲁迅以《阿Q正传》对文化人类学进行实践，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进行考察与认证。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从民族的乡土性中跳跃出来，涵濡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深入思考和表现中国现实生活的精神症候。不仅《阿Q正传》，鲁迅笔下的“未庄文化”、描写“鲁镇年终大典”的《祝福》、吉光屯的“长明灯”、《药》里的“人血馒头”等，共同构建了具有文化人类学特征的“田野文本”，以特有的忧患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刻探寻。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议，将“鲁迅研究”提升为“鲁迅学”，其学理依据是，鲁迅的作品和我们对鲁迅的研究基本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哲学、美学、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其实，归根结底，真正综合性的“鲁迅学”就是一门完全可以用“民族学”来高度概括的“文化人类学”。我们读鲁迅的作品，为什么不仅感到思想深刻，而且视角独特，探究原因，就是其蕴含着具有人类学思想的文化逻辑。

中国现代文学相遇“文化人类学”，是以群体面貌呈现的，这也使运用文化人类学视角和科学方法来进一步推进传统式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极大可能性。郭沫若《女神》的整体构思，就完全体现出文化人类学中神话主题与人类精神自由的关系，将革命浪漫主义与人类学的传奇性有机结合；老舍通过《骆驼祥子》等“京味文学”，从民俗切入文化，从文化探测心理，这是老舍以文化人类学探索国民性十分理智的选择；鲁迅、周作人笔下的“浙东文化”、赵树理的“晋文化”、沈从文的湘西情怀、师陀的“黄河文化”、废名

<sup>①</sup> 古耜. 鲁迅当年的中国梦[N]. 中国艺术报, 2016-3-23(3).

的“荆楚文化”等，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谱系，树立起一块块既饱经风霜又独具风韵的人类文化标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独特色彩和个性图标，异彩纷呈地展现于“地球村”。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性相遇，使隐性的人类学在中国大地上插上飞翔的翅膀，其奠基性的思想认识和方向性的文化价值，是中国文学具有开拓性的历史存在。“西学东渐”有了相遇，有了开启，最终得以渐进，人类共通性的文学因子和文化品性，逐步升华为复合式和整体化并拓展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价值的世界视野和艺术神态。就此而言，深入挖掘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正在国内学术界形成共识。

在“文化人类学”与现代中国相遇与被接受的基础上，一路累积，一路传承，一路创新，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经典作品，立足中国大地，面对社会现实，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人性基础，“讲述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故事”，<sup>①</sup>在当代中国谱写出波澜壮阔的史诗性篇章。

## 第四节 “初始阶段”文化价值的涵濡奠基

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所有新变革和新运动，都以先驱者传承的整体性文化意识作为思想资源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世界上相互影响的思想文化，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契合。解志熙认为，“在二十世纪，整个世界真正被联结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不管是现代化的地区还是尚未现代化的地区，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再能自足自存了，而是休戚与共，生死攸关的。也因此，二十世纪世界各民族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或者相互影响，或者不约而同地达到某种契合”。<sup>②</sup>就此而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复杂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接受、思想传播与意识升华相互“契合”且彼此相融的动态过程。因此，这种两者相遇契合形态的相融度产生出初始阶段较为稳定的奠基性特征。“整个世界被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紧密关系，有效奠定了开拓了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文学领域的根基与发展空间。其世界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人类文化价值，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厚重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拓展了艺术创作的审美维度。

恩格斯(Engels)曾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许多新变革，尽管其根源深藏于经济事实中，但都以文化先驱的思想为其传达信息，并且以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的前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始阶段，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相遇，确切地验证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观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多种思想文化以及“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注入了新的文化思想和精神内涵。“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sup>③</sup>20世纪初，随着引入西方思想文化并大力宣传的时代潮流，国人的文化视野被迅速开拓，“文化人类学”在中国逐步传播，赋予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人类学性质的整体眼光，打开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化之门。与此同时，“人的觉醒与发现”很好地引

① 韩秉宸. 讲述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故事[N]. 人民日报, 2016-4-10(7).

② 解志熙. 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③ 唐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领现代文化寻找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位置。文化人类学恰逢国人“文化先驱”自我意识的觉醒，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股强大文化助力。

中国现代文学对文化人类学的传播与应用，虽处于启蒙时期或初始阶段，但这一历史性相遇，“尤其是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先锋们，更是自觉地突破狭隘的民族范围而思考一些世界性的人类性的问题，反过来也往往从世界的、人类的观点来观察民族的局部的问题。”<sup>①</sup>“初始阶段”这“一反一正”的契合相融，以螺旋上升的形式奠定了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场域和根基。基础越牢固，影响越广泛，价值就越大。一条穿越时光的人文隧道，从这里延伸开来，通向中国文学的世纪岁月。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sup>②</sup>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三重奠基性价值。一是思想启发的广阔性。20世纪初，伴随着思想文化领域“人的觉醒”，文化人类学在中国逐步传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得到有效激活，赋予中国文化先驱者具有人类学性质的整体视野，世界文化之门在中国文学场域被一步步开启，使古老中国的民族思想获得了广阔的世界观。二是文化认同的深刻性。新鲜的未必是深刻的，而深刻的一定具有认同转化的再生观念。世界文明与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认同并逐渐转化后，物理意义的思想观念产生出化学性质的时代反应，东西方文化有机涵濡的深刻性由此进一步显现。这既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学视野的长远眼光，也为文化人类学思想的“中国化”开创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社会认同。三是与时俱进的空间感。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了事物发展的高度，思想文化的价值决定了与时俱进的空间。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普适价值，一经中国大地的涵濡接受，很快就拓展了与时俱进的空间。活力四射的人文因子，生生不息，气象万千，世界性的框架和人类化的肌理，融入东方人文的血脉，不断碰撞出思想火花并持久燃烧。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空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并书写着世纪进程的生命宣言。可以说，文学“文化人类学”的立体化建构，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人文趋势，这一趋势在新中国，尤其是21世纪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正随着人类学视域的拓展，呈现越来越强大的精神气场和时代意义。

与其相识是我们的缘分，与其相融是时代的语境，与“世”共存是人类的“容颜”。

<sup>①</sup> 解志熙. 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sup>②</sup> 叶廷芳. 文学当助人识己[N]. 人民日报，2017-11-14(23).